

隋唐五代卷

中华文化五千年

华夏出版社



110545 1202.8
03
23

中华文化五千年

隋唐五代卷

本卷主编 罗炳良

MS08/09



美院图书馆 A0003029

华夏出版社

1997年·北京

前　　言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数以千万计的文化结晶，为我国和世界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宝贵的财富。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从隋朝统一到唐朝安史之乱前的近二百年中，中原封建王朝国力强盛，政治局面稳定，封建政治制度趋于完备和成熟，封建自然经济空前繁荣。唐末五代时期的一百多年中，虽然兵燹遍地，朝代嬗替频繁，但封建政治制度仍有创新，封建经济也继续发展。随着政治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繁荣，隋唐五代时期的的文化也繁荣起来。隋唐时期全国统一，中国疆域空前辽阔，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条件。首先是境内文化交流频繁，以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为中心，遍及广州、扬州、洛阳、范阳（今北京市）等主要城市，形成一个遍布全国的文化网络。其次是高度完善的政治经济制度，使隋唐封建王朝成为东方乃至世界各国向往的中心，域外文化形成一种向心力，不断输入进来。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使隋唐王朝具有大国的恢宏气度，胸襟开阔，能够实行文化开放政策，兼收并蓄各种域外文化。由于中国封建文化已经发展到昌盛和成熟阶段，处于较低层次的域外文化传入中国以后，不可能对中原文化取而代之，而只能作为一种新鲜血液注入中国文化的机体之中。中外异质文化在共同发展的过程中相互汲取养分，不断融合，最终发展到一个更高水平，更加绚丽多彩。正是在此基础之上，隋唐五代文化继承汉魏六朝文化而又有突破发展，同时吸收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游牧文化以及印度佛教文化、西亚伊斯兰教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成为一个博大精深、辉

煌灿烂的文化体系，不仅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顶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史上的高峰。

在政治文化方面，隋唐时期我国的封建政治制度逐渐成熟。政治制度中以三省六部为主体的政治体制，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官僚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以科举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封建官僚政治形态正在形成，逐渐取代了前朝延续下来的门阀士族政治形态，推动了封建政治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隋唐五代时期一些著名的政治家，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形成了系统的政治思想，成为隋唐五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它不仅促进了隋唐五代政治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而且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各朝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提供了借鉴和助益。

在学术文化方面，这一时期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异常活跃，儒、道、佛三种学术思想体系并存，而且有了进一步发展。儒学由传统的注重章句的汉学体系开始向注重阐释义理的宋学体系转化，儒家思想表现出充沛的活力，拓展出一种新境界。隋唐五代的思想家如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突破了儒家训诂名物的研究方法，开始谈论穷理尽性的问题，使缺乏形上思维的传统儒学更具有思辨性，从而促进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道教经过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这一时期更加兴盛，成为道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道教发展不但表现在其地位被统治者推崇，居于儒、佛之上和宫观、道冠数量增多，更主要表现在道教思想的发展方面。道教由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炼丹服食为主的丹鼎派转变为以吐纳养生为主的内丹派，进一步理论化。隋唐五代时期也是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顶峰时期。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发展的基础上，到隋唐时期正式形成了涅槃、三论、毗昙、净土、成实、华严、天台、法相、摄论、地论、律、密、禅13个宗派。中国佛教思想在印度佛教注重因明思辨的基础之上，又吸收了儒学内圣外王的传统思想，简化了原始佛教繁琐的论证，更容易被接受。它通过唯心主义本体论、相对主义诡辩论和神秘主义证悟论

三者结合，发展成为严密的思想体系。佛教的产生在印度，但佛教的发扬光大却是在中国。随着隋唐时期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完成，便取得了比印度本土佛教更加宏伟的业绩，影响中国社会文化之深可以和儒学相提并论。儒、道、佛三种学术思想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吸收，最后形成了更高理论层次的理学思想。

在科学文化方面，隋唐五代时期的历史学、地理学、语言文字学、天文历学、算学、医药学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

在艺术文化方面，百花盛开的唐文苑堪称艺苑奇葩，唐诗历经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阶段，异彩纷呈，诗人辈出，艺术成就达到古体诗空前绝后的地步。古文、白话传奇的复兴，开了明清小说的先河。曲词到唐末五代已经在文坛上独树一帜，成为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形式，为宋词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杂技等等更是令人耳目一新，流派纷呈，诸家并秀，不但在艺术实践中成就斐然，而且能够从理论上进行总结。

隋唐五代文化渊博宏阔，遗留下来的文化史故事更是不胜枚举。《中华文化五千年》隋唐五代卷从浩瀚无垠的文化史林中撷取数十个文化史故事，虽然力求照顾到方方面面，但却是沧海一粟，难免挂一漏万。编者的意图在于遴选那些影响较大、故事情节更精彩的事例，以便人们能够简明扼要地了解中国文化史的轨迹，谋求一种寓教于乐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尝试。至于客观效果，只有请读者评判，批评指正了。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略述数语，以志初衷，着为书序！

罗炳良

1994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1)
京杭大运河	(1)
隋朝音乐家万宝常	(6)
著名建筑家宇文恺	(10)
李春与安济桥	(14)
“时俗共重,以为规典”	(18)
裴矩与《西域图记》	(23)
吕才反对宗教迷信	(28)
儒、佛、道“三教论衡”	(32)
吉藏与三论宗	(37)
法藏与华严宗	(41)
惠能与禅宗	(45)
善导与净土宗	(50)
智𫖮与天台宗	(54)
玄奘与唯识宗	(58)
魏征敢直谏	(62)
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67)
长孙无忌与《唐律疏议》	(71)
王梵志与五言白话诗	(76)
初唐四杰	(81)
阎立本与绘画	(86)
唐初修史	(89)
文成公主进藏	(94)

唐都长安城	(99)
静琬与云居寺	(103)
玄奘与《大唐西域记》	(107)
历算学家李淳风	(112)
“药王”孙思邈	(116)
“麟凤”“雄才”陈子昂	(121)
武则天善用人	(125)
一代名相张九龄	(130)
宫廷女诗人上官婉儿	(134)
李隆基与梨园	(138)
李白蔑视权贵	(143)
乐工李龟年	(147)
“吴带当风”	(153)
张旭、怀素学草书	(159)
颜真卿、柳公权学楷书	(163)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167)
“诗圣”杜甫	(175)
琵琶乐师段善本	(180)
诗坛巨擘杜牧	(185)
韩干画马	(189)
鉴真东渡日本	(192)
靺鞨源流与“渤海文化”	(198)
张遂编制《大衍历》	(203)
“茶神”陆鸿渐	(209)
刘知己与《史通》	(214)
杜佑与《通典》	(219)
刘晏善理财	(223)
韩愈谏迎佛骨	(228)

柳宗元被贬	(234)
刘禹锡遭谪	(238)
李翱倡“灭情复性”	(244)
千古直臣刘諤议	(248)
僧侣诗人贾阆仙	(253)
段成式与《酉阳杂俎》	(258)
贾耽与《海内华夷图》	(263)
李吉甫与《元和郡县图志》	(267)
歌妓女诗人薛涛	(271)
“女中诗豪”李冶	(275)
白居易刻苦读书	(280)
晚唐诗人李商隐	(284)
女冠诗人鱼玄机	(290)
张彦远与《历代名画记》	(295)
中朝文化交流的使者崔致远	(299)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	(304)
敦煌莫高窟	(308)
唐朝帝王崇奉道教	(313)
隋唐时期的音乐艺术	(318)
唐代的雕塑艺术	(322)
唐代的杂技艺术	(327)
唐代的舞蹈艺术	(331)
唐代的传奇小说	(335)
花间词派与南唐词派	(340)
诗词兼工的花蕊夫人	(345)
“黄家富贵，徐熙野逸”	(350)
“长乐老”冯道	(354)
道教思想家陈抟	(358)

京杭大运河

每当翻开祖国地图便可看到，我国内地河流多是从西向东流淌的，然而在其间只有一条是南北向的河流，它北起北京，南到杭州，贯通河北、山东、江苏、浙江4省，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连接起来，这条河就是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全长1794公里，它开通于隋朝，是我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人工河。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利用自然水源修筑人工河道、灌溉农田和进行运输的历史。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进攻齐国，运兵运粮，征调大批民夫，在长江、淮河之间开凿一条运河，叫做“邗沟”。这就是后来大运河在江苏境内的一段。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相继修建了一些渠道，这些渠道虽然断断续续，却使大运河的开凿，在江南和中原地区初具规模了。

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早在两汉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北方的经济比南方进步很多。据司马迁说，直到汉武帝时，长江以南的农业生产仍然是“火耕水耨”。三国以后，特别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长期战争，人民大量南迁，他们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南方人民共同开发富饶的处女地。江南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而两浙，特别是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一带）是“亩值一金”，士族门阀盘踞之处，其肥沃程度可与陕西关中相媲美。隋朝建立后，建都长安，其政治统治中心在北方，而北方的城市和边防军的粮食，大多要依靠

江淮地区供应。陆路运输要依靠马车和人力车，不仅运量小，速度慢，而且费用很大，却仍无法满足北方各地的需求。利用水路运输，是较为经济实惠、切实可行的办法，所以，开凿大运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在政治上，隋王朝刚统一中国不久，为了巩固政权和统一的局面，需进一步控制新统一的东南地区。当时江南阶级矛盾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始终比较尖锐。公元 590 年，江南士族沈玄侩、汪华等聚众反隋，或称天子，或称都督。隋文帝调集大军，历时 2 年才平定江南叛乱。公元 600 年，李英林起兵于熙州（今安徽安庆市），第二年，潮州僚民起义。由于南方人民的不断起义，于是隋文帝下诏没收天下兵器，严禁私造。同时更禁止江南人私造大船，凡是 3 丈以上的船只，一律由国家没收。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目的在于使南北运输畅通无阻，加强对南方的统治。

除上述原因外，隋炀帝游玩享乐之心也是开凿大运河的动机之一。隋炀帝过去曾长期担任江都总督，驻扎扬州，醉心于江南的豪华生活。所以由于怀念江都繁华美景，也迫使他想开凿大运河。

隋朝统一中国后，人民得到安定的社会条件从事生产，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十几年后国家也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这也为修造贯穿南北的大运河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可能性。

早在隋文帝时期，就开了广通渠和山阳到江都的邗沟。公元 584 年，隋文帝为了漕运（即河运）的便利，令当时著名的建筑大师宇文恺率水工开广通渠，引渭水从大兴城（今西安市）到潼关，与黄河相接，长 300 里。广通渠开通后，便利了关内漕运。公元 587 年，隋文帝又沿着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邗沟的旧道，南起江都，北至山阳（今江苏淮安），沟通江淮。隋文帝利用这条渠道运兵运粮，为用兵江南作准备，第二年，隋即出兵灭掉陈国，统一了中国。但是，大规模开凿修建大运河，还是在隋炀帝上台以后。公元 605 年，隋炀帝征发大批士兵和民役开始修建，到 610 年底，大运河工程基本完

成，前后费时 6 年。

隋朝大运河共分为 4 段：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

公元 605 年，隋炀帝下令征发河南、淮北 100 多万士兵、民夫，开始开凿通济渠。通济渠北起东都洛阳的西苑，南到安徽的盱眙。它引谷水、洛水入黄河，进入黄河后，利用黄河的一段河道，到达板渚（今河南汜水东）。从板渚再引黄河水南流，使河水进入睢水。睢水经中牟、开封、陈留、高邮、泗县，入泗水，而进淮河。这段运河是利用古代运河渠道，加以拓宽，所以从当年 3 月开工，8 月完成，2000 里的渠道只用了 100 多天。

淮河与长江之间，隋朝以前有邗沟相通，邗沟北起山阳南到江都（今扬州）。邗沟在隋以前，多次改道，河道狭窄，根本无法通行大船。隋文帝开邗沟，只是整治了邗沟入淮水的水口，并没有彻底清理河道。隋炀帝征发 10 余万士兵和民夫，把旧有的邗沟拓宽取直，从山阳直达扬子（今仪征），从而直通长江。

公元 608 年，开凿永济渠。这段主要是利用自然的河道，沟通沁水和淇水，引沁水入淇水，在涉县北部会合，一直北流到天津入海。永济渠就是利用这条天然的水道向北伸展，然后入永定河，北达涿郡（今北京通县）。

公元 610 年，隋炀帝下令开江南河。江南河北起京口（今江苏镇江）南到余杭（今杭州）。隋朝以前，长江以南已有不少小运河，这次开河就是利用旧日的小运河，加以拓宽。然后引长江水，穿小运河，绕过太湖，直达杭州。至此，大运河全部开通。

建造这样规模宏大的工程，劳动群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隋炀帝强征几百万民工，要他们带着工具和口粮，去开挖运河。男人不够，就以妇女补充。恶劣的劳动条件，严苛的官吏监督，使饿死累死的民工不计其数，其中十分之四五的民工惨死在运河工地上。当时有个督工的将军名叫麻祐，非常残暴，谁做慢了，就用棍子毒打，人们把他看作吃人的妖魔。沿河地区的小孩哭闹，只要一听大人说：

“麻祐来了”，就吓得立即止住了哭声。谁知在那些岁月里有多少农家的田园荒芜了，有多少妻子成了寡妇，婴儿成了孤儿，挣扎在死亡线上！繁徭重役的可怕，竟致使不知多少人忍痛砍下自己的手足。伤残者可以避免役死他乡，故而被称作“福手福足”。

隋炀帝在修运河同时，还下令在两岸筑起御道，种上杨柳树。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 40 多处。他派人强征民间美女住在离宫，备其淫乐。大运河筑成后，隋炀帝率领文武百官以及和尚、道士、尼姑，还有皇族家眷、宫女奴婢，乘坐数千艘大船到扬州看“琼花”。巡游船队首尾相接，长达 200 里。隋炀帝乘坐的那艘最大的龙船，就有 200 尺长，4 丈 5 尺高，船上还盖了 4 层的宫殿，100 多间房子。每个房间里都有宫女。岸上有 8 万多名纤夫拉船，卫士沿途保护，隋炀帝一次又一次巡游。每到一处，几百里之内的州县，都要“贡顿献食”。最多的一州要送 100 多车。而且，饭菜都是山珍海味，美食佳肴。他们吃不了就投到大运河里。隋炀帝对献贡丰厚的州县官吏加官提职，对稍不如意的就免官降职、甚至砍头。因此，地方官吏为升官发财，拼命搜刮百姓。社会阶级矛盾急剧尖锐起来。隋朝很快就在农民起义浪潮中灭亡了。

大运河的开通，大大便利了我国的水运事业，使南北交通有了显著的改进，它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加强了南北的联系，对于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全国的统一，起了很大作用。大运河开通以后，南方的稻米，丝绸源源不断北运，供给北方。隋朝在河南修建了许多粮仓，里面储存着南方运来的大量粮食。由于运河的开通，运河两岸的扬州、杭州等许多城市繁荣发展起来。唐朝有诗人形容当时扬州的繁荣说：“有地惟成竹，无家不养鹅；春风荡城廓，满月是笙歌。”到唐宋时期，隋朝开通的大运河，发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人们感叹地说：“天下转漕，仰此一渠。”

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对黄河起了分流的作用。每当黄河涨水季节，部分河水通过永济渠和通济渠泄出，减少了黄河的压力。大运

河开通以后，数百年间，黄河未发生大泛滥。

后来的各个朝代，从维护统治阶级切身利益出发，都继续使用和修复大运河。元朝定都在大都（今北京），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移到北方。因而，需要一条直通南北的运输线。元世祖忽必烈，在公元1289年下令开凿会通河。这条河北始临清，南到东平路（今山东境内）的安山。又从北京到通县间开了一条通惠河，与原有的河道沟通。这样一来，由杭州到北京，就可以不绕道洛阳，直接到达。而隋朝开凿的部分河道由于年久淤塞，未加清理，逐渐废弃。现在的大运河，基本上是元朝的河道。

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举，是他们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它是世界上人工开通的最古老最长的运河，比世界上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早100多年，长度是它们的十几倍乃至几十倍。大运河和万里长城同样闻名于世界，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刘林桦）



隋朝音乐家万宝常

在中国历史上，隋朝因历史短暂和后来唐朝的空前盛大而被一般的人们认为在各方面似无建树。其实，隋朝除了开凿大运河这样的壮举外，文化艺术也是高度发展的。比如音乐、舞蹈等，为盛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里，我们介绍一位鲜为人知的大音乐家，他就是卓越的演奏家兼乐理家——万宝常。

对于这位尊敬的艺术家，除了少数研究中国音乐史的专门学者以外，恐怕连知晓其名字的人都不会太多，而那些少数研究音乐史的学者们，对于他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技艺可能也没有细心地搜寻过。因此，在谈到隋朝文化艺术时，我们不能不对这位几近埋没的艺术家作一些介绍，以澄清人们对隋朝历史文化不正确的认识。

万宝常的生平事迹，资料最为丰富的是《隋书》。《隋书》的编纂者魏徵、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颜师古、孔颖达、李淳风诸人，在《艺术传》中为万宝常立了传，又在《乐志》和《律历志》中记叙了他学艺的情况。后来，李延寿在《北史·艺术传》也转录了《隋书》的内容。不论怎样，上述的诸位学者，对有才华的、但遭遇坎坷的万宝常还是抱有深深的同情与真诚的敬意，这些在我们读万宝常的本传时是能体验出来的。

根据本传提供的材料，再参照其他史料，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万宝常的有关情况。万宝常生于南朝的梁末，与他父亲万大通的上司、梁末的大将王琳是同乡人，大概是会稽山阴人。后来王琳投归北齐，万宝常父子也从江南到了北方。不过，那个时候万宝常的年龄很小，大约四五岁。来到北齐以后，万宝常向当时一位著名的音

乐家，也是一位达官祖珽（字孝徵）学习音乐。《隋书·音乐志》上记载说：“有识音人万宝常修《洛阳旧曲》，言幼学音律，师于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调古乐。”因为祖珽的父亲祖莹做过北魏的太常卿，曾经典造过洛阳的钟石管弦，3年而成。所以，祖珽所教音乐知识和万宝常所修的《洛阳旧曲》，便是从祖莹这儿来的。本来音乐的学习是以幼年为适当的，因为绝对音的认识只有在年幼时才锐敏，在10岁以后便会游移而不能准确。因此，万宝常在向祖珽学音乐的时候，他也只有八九岁，正因为这个年龄是学音乐的好时光，所以万宝常以他的勤奋与天资，学得了真正的本领，这从他以后在生活中能随便敲打食器而成宫商的那段记载里得到证明。这种本领，不从幼时着手，是不能得到的。

后来，万宝常的父亲万大通因获罪被杀，万宝常即被配为乐户。按“齐法”，配乐户的刑罚是与强盗同罪，其地位实际上是奴隶。这种打击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没有故乡，没有故国，失去了亲人，在异乡他壤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他是难以生存的。然而，音乐的天才没有因为灾难而埋没，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也没有因为打击而窒息，万宝常视音乐为生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万宝常在音乐方面的造诣是很高的，《隋书》本传上说：“妙达钟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献于齐。”但是，他的奴隶的生涯（伶人）却终生没有得到解脱。尽管他在音乐上的成就，在隋开皇时代就是大臣宰相、至尊天子都不能够抹杀，作乐时要征求他的意见，然而奴隶毕竟是奴隶，“历周洎隋，俱不得调”。北周灭齐后的年代很短，仅仅4年便失国。隋朝开皇年间讨论音乐，大官僚、博士郑译、牛弘、辛彦之、何妥、苏夔等“各立朋党”，纷纷立论，闹了七八年，才龙头蛇尾地宣告终结。万宝常用水尺律造器，但又受到权贵们的忌恨，随之而寝置。大约在开皇十一、二年（公元591年、592年）时，万宝常贫病交加，“竟饿而死”。据有的学者考证说，他死时不满40

岁。万宝常没有后代，他病卧时，妻子将家中仅有的一点财物全部窃取而逃走了。万宝常临死时，将自己所写的音乐论著投之火中烧掉了，并悲愤地说：“何用此为？”表现了对压迫他、给他带来灾难的丑恶、卑劣社会的最后抗争和不妥协的精神。

万宝常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对隋朝的音乐发展是有杰出贡献的。本传上说他“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改弦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一千八声。”“至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无所碍滞，见者莫不惊叹。于是损益乐器，不可胜记。”“开皇之世有郑译、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世所用，至于天然识乐，不及宝常远矣。”从上引的记载可知，万宝常在音乐方面的天才，是同辈人望尘莫及的。就是那些嫉妒他、排毁他的显贵及同行，也不得不“然皆心服，谓以为神”。

万宝常在乐制乐论方面有着重要的建树，他不仅继承发扬了中国原有的音乐传统，而且也注意吸收外来的音乐，创造了一种适合于当时的新乐。中国音乐的发展，自始至终都受到外来音乐的影响。就乐器而言，中国固有的乐器不外磬、竽、鼓、钟等几种，有了琵琶、筝、横笛、胡笳等外来乐器的输入，中国乐器的发展才蔚为大观；就乐律而言，中国固有的乐律不外是宫、商、角、徵、羽的五音，有了十二律的输入，中国的律制便成为了双重化，才不致于单一。而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隋、唐时期，按研究中国乐史的专家的说法，这一时期是胡乐期，即西域和印度的音乐传到中国，这恰好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政治形势。晋室自永嘉南渡而五胡乱华，接着便有长期的南北朝的分裂，中国的北部是在胡人的统治之下。在那些胡人统治者的优裕生活中，把西域的音乐种子输入进来，在丰润的自然环境里开出了灿烂的繁花。而在南北朝的末期，和中国政治局面由汉族统治的南朝与异族统治的北朝行将归于一统一样，由西域传来的胡乐与前代的中国雅乐即古乐，正在孕育着一个新的合成。万宝常正生活在这个时代之中，他既继承了前代的雅乐，也

接受了西来的胡乐，可以说是一个综合派。因为祖莹所造的《大成乐》是“戎华兼采”；祖珽所造的《广成乐》是“具宫悬之器”而“杂西凉之曲”。万宝常承继了两代而来，可以知道他的伎艺是融会华戎。当然，综合派不是纯粹的华，也不是纯粹的戎，它是更高一层次的统一与综合，具有两种的成分，因而在过渡时期便不免要受双方的排毁，守旧者说它带戎风，革新者说它挟华臭。祖氏两代的新乐，没有维持住长久的生命，万宝常的新乐也不为隋世所用，时代对于综合派还不十分成熟。这在《隋书·音乐志》中关于开皇乐论的记载里得到证实。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万宝常的艺术理解为近代人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东西。万宝常生活在胡乐盛行的时代，他彻底地学习胡乐，使胡乐成为了自己的东西，更进一步于胡乐所未完备处又创造了新的内容。他在这新的创造方面利用了中国旧有的乐器，旧有的律名，绝不能认为这是复古。他利用的是旧乐的形式，而他的成就是更高一级的发展。他是把中国的旧乐翻新，把胡乐也推进了，可叹息的是中国人中没有后继者，在唐初盛极一时的新乐，中唐以后便衰颓了下来。例如八十四调见诸实用的竟不知多少，《旧唐书·音乐志》所言模糊，而《新唐书·礼乐志》所存的仅七宫七商七角七羽二十八调了。《辽史·乐志》亦载二十八调。到了南宋，二十八调只剩下了十八调。元、明以来的南北曲则各剩下十二调之名目，内容是大有改易的。其他更可想而知了。

值得欣慰的是，当代的音乐工作者在学习引进洋乐时，也注意挖掘、再现我们的优秀古乐，一些电视片，电视历史剧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如 40 集电视连续剧《唐明皇》中再现的唐乐，就是如此。

(刘昌安)